发展旱粮成稳粮增收新途径

五谷杂粮，配角也精彩

浙经观察

记者 颜伟杰 通讯员 厉宝仙

随着乡村旅游业发展，番薯枣需求量越来越大，永嘉山区农民纷纷开办番薯枣加工厂，图为岩头镇西下村村民忙着晾晒番薯枣。 叶圣义 苏巧将 摄

“我们的春马铃薯品质很好，上门收购每公斤也能卖四五元，一亩可收1500多公斤，亩均产值能有6000元左右。”近日，兰溪市梅江镇西塘下村村民柳开进正忙着对采收后的马铃薯田地翻地整畦，准备再播一季春马铃薯。

当人们对生活的追求越来越精致，马铃薯、玉米、荞麦、番薯等旱粮对于改善和调整饮食结构的作用正被更多人认识，旱粮也渐渐成为不少家庭餐桌上的新宠。

田间地头，曾经是粮食生产“配角”的旱粮，这两年也越来越受到农户的欢迎和重视。据统计，今年全省旱粮面积预计达到667.3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多，比上年增加29.8万亩，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全部得益于旱粮。

“发展优质旱粮，已成为我省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农民收入的新途径。”省农业厅农技推广中心黄国洋说。

新品种走上餐桌

“在浙江这样的地方推广旱粮，品种很重要。”兰溪市农作物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吴美娟说，相比一般的马铃薯，兰溪的春马铃薯选用了早熟高产品种，播种早、收获上市早，而且吃起来鲜嫩爽口，深受杭州、上海等大城市消费者的欢迎，价格也非常好，在省内外市场有了较高知名度。

但是，以前农民种的土豆是没人要的。吴美娟介绍，因为口感差，兰溪的土豆一度只被当地农民作为猪饲料，可又不能不种，因为兰溪的土质非常适合种土豆。“所以我们全国跑，引进各地的土豆品种试验。最后才定下了‘东农303’、‘中薯3号’等品种。”吴美娟说。

无独有偶，在我省甘薯传统特色加工产品“烤薯”的主产区——丽水遂昌县，15万亩农田有近半种植旱粮，而番薯的种植面积几乎是所有旱粮的一半，达到近4万亩，这其中，由省农科院研发培育的番薯品种“浙薯13”，在遂昌遍地开花。

据了解，省农科院研发的“浙薯13”品种，从1999年起便开始在遂昌试验示范，因为淀粉含量高、水分少，在温差大的山区糖化速度快等特点，迅速取代“舟农白皮”等老品种，到2001、2002年开始大面积种植，成为主导的甘薯新品种。

大洞源村52岁的村民俞娇茹，从她开始种田，家里的地里就没少过番薯。“早些年我们种的老品种，没什么产量，做成烤薯只是给家里小孩子当零食。”俞娇茹说，现在种的“浙薯13”，加工成烤薯后颜色金黄、软糯香甜，每年为村里创造超过150万元的产值。

而在省农科院甘薯组专家季志仙看来，番薯的“文章”远不止这些。省农科院在龙游等地种植的菜用甘薯——番薯芽，经过两年多时间培育和推广，这种新品种番薯茎秆不用剥外皮，吃起来脆嫩、香甜，口感更好，现在早已被市场接受，为当地农民增收提供了新途径。

新模式扩产增收

磐安县冷水镇潘潭村农民卢荣根创办的五谷神粮食专业合作社，3000亩土地都采用“浙贝母+甜玉米+晚稻”的种植模式。“鲜贝母亩产值2.7万元，甜玉米亩产值1400元，水稻亩产值1600元，三季相加超过3万元。”卢荣根说，更重要的是，通过水旱轮作，改善土壤，降低农作物病虫害，有利于第二年浙贝母的生长。

这两年，我省积极探索粮经结合新模式，实现了粮经双丰收。黄国洋介绍，通过引导农民创新农作制度，鼓励水旱轮作、旱地间作套种、林下套种等新型农作制度，增加旱粮播种面积，提高旱粮生产效益。目前，我省已经探索出10多种旱粮高效栽培模式。

旱粮效益的提升，为我省守住粮食生产红线分担了部分压力。在粮食安全日益被提及的今天，坚持口粮基本自给，我省粮食生产提出了三条“红线”——保持300亿斤生产能力、160亿斤生产总量和55亿斤储备，从2008年以来，我省粮食总产已连续6年低于160亿斤。

要守住粮食总产“红线”任务越来越艰巨。黄国洋介绍，以前因种粮效益较低，我省的粮食总产连年下降，不过今年得益于旱粮效益的提升，旱粮播种面积增加，我省粮食生产形势较好，自2010年以来，再次拥有1900万亩。

这也说明了在扩大旱粮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和挖掘市场方面，“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从去年底开始，我省陆续出台加快发展旱粮生产措施，实施旱粮种植直补政策，在执行中央和省级大小麦生产扶持政策基础上，省财政对经认定的连片100亩以上旱粮生产基地种植者，按种植面积给予每亩125元的补贴；对在果园、桑园和幼疏林地间作套种同一旱粮作物100亩以上的种植者给予每亩20元的补贴。

给力的政策，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海盐县年丰家庭农场主王钰去年冬天种植了300多亩小麦，“自从省政府出台小麦订单收购并实行订单奖励政策后，我特地季节性流转了300多亩冬闲田种小麦。”王钰说。

据了解，通过旱粮高产优质基地建设，我省将初步形成浙中、浙南、浙西三个旱粮产业带。

深加工拓宽市场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关注，一直作为配角的营养丰富的粗粮，在餐桌上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何研发加工出旱粮新产品，使其类型、口味更丰富，更符合市场需求？浙江农民凭借着历史形成的知名农产品和敏锐的市场头脑，对旱粮加工、上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已经延伸覆盖到了全产业链。

遂昌县石练镇的遂昌金色食品有限公司，从1998年开始便专注于薯类加工。最初，他们从农户手中收购半成品做真空包装、杀菌，但每个农户的制作工艺都有着微妙差异，收购来的粗加工品水分、色泽、厚度不一，产品质量很难保持。

于是，夫妇俩与省农科院的专家一起，研究起工厂化的烤薯加工工艺。如今，金色食品自主研发、定制的烤薯机械化加工流水线投入使用，不仅打出了“只要是‘浙薯13’品种，我们都收购”的霸气宣言，更引导农户种植番薯。

浙江海通集团则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帮助农户打开旱粮出口市场。“我们在宁波、台州等地建立了10万亩旱粮订单生产基地，每年消化蚕豆、毛豆、玉米等旱粮12万吨，年出口量达6万吨，为3万多农民提供了旱粮的销售渠道。”企业负责人说。

产品的深加工日渐增多。浙江晨云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包重400克的有机玉米面条售价20元左右，比用细粮制作的面条贵了三分之一；此外，用旱粮加工而成的饮料，如红豆汁、绿豆汁、紫薯汁等，因为可以方便地“以喝代吃”，也很受消费者青睐，浙江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八宝粥就是其中的代表。

更全面的整合也屡见不鲜。如诸暨的“同山烧”高粱酒，带动了同山、牌头、安华等山区镇为中心的红高粱种植2.8万余亩，同时打造出了以红高粱为特色的“美丽园区”、高粱酒烧制休闲旅游示范景区，变身成为种植加工、休闲旅游的全产业链基地。

财经微观点

金融改革的新起点

人民日报

存款保险的“精妙之处”，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宣布对众多的一般存款人的存款提供明确的全额保障。存款保险解决的主要是众多的小额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问题，是在中央银行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对现有金融安全网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现在社会对放松管制、发展社区银行、小银行的呼声很高，为什么不能大幅度地放宽准入？根子上还是担心存款人的保护，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如果存款安全和风险及时校正的机制解决了，这方面就可以迈出较大的步伐。

让降息真正惠及企业

经济日报

近日，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当前重要的是，必须确保降息政策真正降低融资成本，惠及广大企业，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根据历史经验，即便是降息这样带有刚性的政策也不一定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现实中，不少企业往往遭遇银行各种理由，导致实际贷款利率较大幅度上浮，有的仅低于民间拆借利率，致使企业一直处于融资贵、融资难的怪圈。此次央行降息政策出台后，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机构，应当加大对银行贷款行为、收费行为的监管与规范力度，严格执行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业务规定的“七不准”与服务收费“四公开”，继续治理乱收费，坚决遏制各种可能对降息红利带来对冲和影响的行为。

京津冀“三结义”

京津冀三省市，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历史渊源深厚，具备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然而，长期以来，三地在行政壁垒下各自为政，经济联系松散，在区域合作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迎来崭新的发展阶段。三省市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各就各位”，找到差异化的定位，融入协同发展，寻求合作共赢。

统筹共享科研设备

科技日报

近日，《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引发社会持续关注。据了解，全国仅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单位就有5万多家，对科研设备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近9万台（套），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总量54918台（套）。一方面是科技类企业对科研设备翘首以盼，另一方面是设备使用率高低不均，科研院所的部分科研设备长期闲置。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家网络管理服务平台，统筹共享大型科研仪器，既可满足科技型企业对科研设备的广泛需求，又可以盘活闲置设备资源，将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山区和乡村发展的明智之选

浙富论 ·区域经济谈

刘亭

两个月前，我曾写过一篇《生态经济的路径选择》，就我从书本报章上读来的种种印象，对此发表了一通观感。后来有机会到台州的仙居县实地一游，在耳闻目睹一番之后，那一个“虚头八脑”的动听概念，立马鲜活生动起来。于是想到索性以仙居为例，多侧面地展开一下我对发展生态经济的粗浅认知，并以此求教于大方。

对于我省山区发展的生态经济，我曾用一个简明直白的算术加法式加以表达：“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人居=生态经济”。结果到仙居一看，居然都行得通、且已是活生生的发展实践了。

先来看看生态农业。他们的立意甚高，张嘴便是要“打造中国最高端农业”。本来我就对滥用“最”字不以为然，便诘问所谓何来？哪知对方应裕自如，当场就举出仙居杨梅和仙居三黄鸡来，号称为同类产品中全国第一品牌。我说农产品并非工业制成品，往往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具有公平的可比性，而农产品无非是以独特的口味和高出同类产品的价格称雄天下，倒不在比拼那个数量和规模。他们不便拂了客人的脸面，便接口“最高端”正是他们志在必得的奋斗目标；即便今天已是“第一品牌”，自己也是要兢兢业业、“保持晚节”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心里自然都明镜似的：大呼隆的、靠化肥和农药养活的、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东西，就不好意思再高攀那个生态农业的“高大上”了。正因为此，县里下决心引进台湾的品种和技术，创办台湾农民创业园；招来10亿元工商资本，建设海亮有机农业观光体验基地；并谋划打造国际国内精品荟萃、九大色系异彩纷呈的大江南牡丹园。为了擦亮“中国杨梅之乡”的金字招牌，浙江杨梅研究院已落户仙居，将集聚天下杨梅培育、种植和加工的“各路神仙”在此各显身手，大展宏图。

再来看看生态旅游业。关于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县里的手笔也是够大的。一句“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口号，就把他们的雄心壮志昭告了天下。一个偏远山区县这样说，是否有点自不量力？那泰山不是垒的、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也不是吹的：“长三角最佳慢生活旅游名城”、“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头衔，都是省外更大范围的认可，也恰恰是仙居特色旅游的亮点所在。譬如县里每年举办的杨梅节和油菜花节，早已成了浙江省知名的农事节庆旅游品牌；而两条“观光带”，也被戴上了“中国美丽田园”的桂冠。仅去年的“两节”，就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亿元。其中旅游者参与的杨梅采摘一项，就让当地农民人均增收千元。对于仙居来说，旅游的发展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虽然去年该县的旅游业增加值已达15.2亿元，税收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5.1%，那也不过是“冰（金）山的一角”。随着永安溪小流域景区、大神仙景区和淡竹原始森林景区的保护性修复和开发，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申报，全域“山水画”的景观和品牌效应彰显，那生态旅游广阔的发展前景，还远远在后面呢！

最后再看看生态人居业。“污水要纳管、活水要穿村、人畜要分离、见缝要插绿、一户多宅要拆除、门前屋后要整洁”的“六要”，就是仙居全民参与的“我爱我家”环境综合整治。不是搞“五水共治”吗？自觉自愿的投工投劳回来了。不是搞“三改一拆”吗？“穿衣戴帽”的“黄皮屋（赤膊房）”治理也开始了。宋真宗当年以“洞天名山，屏蔽周卫，而多神仙之宅”，赐名仙居。在经过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化浪潮洗礼之后，仙居县境内森林覆盖率仍高达78%，出境断面水质和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殊为不易。最难得的还是，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连续三年都在96%以上。如今这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到哪里去找？生活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之中，又是何等的幸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各行各业在不断进行细化和专业化分工的同时，却又在显著深化着互相之间的联动和融合。一个人离不开吃住行，这既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和生活需求，又是最现实的产业和生产供给。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生态人居，就是生态文明大背景下人类的吃住行。由此可见，生态经济并不玄妙，其实就是自然界生态环境和人类基本供求吃住行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平原和城市显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主战场，山区和乡村不必也不可能照搬他们的发展路径，而走好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则是把自己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雄厚的生态资本最明智、最现实的选择。

（作者为区域经济研究学者）